

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之创新性发展^{*}

焦晓云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以破解新时代大党独有难题为实践指向，从基础理论、科学思维和制度体系三个维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创新性发展。在基础理论层面形成了以核心概念、战略判断、研究范式为基础的核心架构；在科学思维层面构建了系统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有机统一的方法论体系；在制度体系层面形成了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监督制度多维协同的治理格局。这一思想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系统性和实践性，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建设 基础理论 科学思维 制度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阶段。面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长期性复杂性，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历史担当，围绕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提出系列新思想新战略，作出系列新安排新部署，推动党的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发生格局性变化：党内政治生态实现根本性好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更加成熟定型，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其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理论精髓，又立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活实践，在基础理论架构、科学思维创新和制度体系协同等维度实现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的革命性突破，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①，不仅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世界各国的政党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國方案。

一、党的建设基础理论的时代跃升

基础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突出特点。这一创新立足于新时代

^{*}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推进文明乡风建设的时代使命和实施路径研究”（24ZDA073）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5年，第4页。

管党治党的生动实践，通过核心概念的原创性建构、执政规律的战略判断和理论阐释体系的丰富完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时代化跃升，彰显了百年大党理论创新的历史主动和理论自觉。

（一）核心概念的原创性建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但其理论阐释囿于特定历史条件，难以直接回应新时代政党治理的复杂命题。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鲜活实践，通过建构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新概念，为新时代管党治党实践提供了精准的话语坐标。这种概念创新遵循实践探索、理论抽象、范式重构的生成逻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内核的基础上，突破西方政党理论的解释框架，构建起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的党建话语体系。新概念的创设不是简单的术语更迭，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深化认识，是对政党治理规律的系统重构，更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经验的理论升华。

第一，大党独有难题的原创性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创造性提出大党独有难题的核心命题，系统揭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的特殊矛盾。

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三重理论突破：其一，在认识论层面突破传统党建理论的“规模中性”假设，明确提出政党规模与治理效能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队性质，但未深入探讨超大规模政党治理的特殊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现实情境，科学揭示大党之难的本质在于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其二，在方法论层面构建“六个如何始终”的系统分析框架，将初心使命、执政能力、精神状态、自我纠错、政治生态等要素整合为有机治理体系。这种分析框架既继承列宁关于党的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的思想精髓，又创新发展出涵盖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能力建设的复合治理模型。其三，在价值论层面确立破解难题和巩固执政的内在统一性。大党独有难题的提出并非消极的风险警示，而是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推动执政能力的迭代升级，其理论旨归在于通过持续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目标。

第二，党的自我革命概念的创造性转化。自我革命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实践精髓，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自我革命确立为破解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①，实现了革命理论的范式革新。马克思主义经典语境中的“革命”主要指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社会形态更替的客体性实践，而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将“革命”的客体转向政党自身，构建起主客体辩证统一的理论新范式。

这种理论转化包含三个维度：其一，在哲学维度突破革命与被革命的二元对立思维。在自我革命话语中，共产党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由对立向统一的转换。其二，在历史维度揭示自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强调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的历史，将延安整风、真理标准大讨论等历史经验升华为规律性认识，从而找到了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的

^① 参见《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59页。

政党治理新路。其三，在实践维度形成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闭环机制，构建起思想教育、制度约束、文化浸润、实践锤炼相结合的治理路径。这种转化既继承马克思主义政党批判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本质属性，又创新发展出刀刃向内的治理哲学：在认识论层面，确立问题导向的改革逻辑，将政党治理转化为持续的问题发现和解决过程；在方法论层面，创建标本兼治的实践策略，实现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在价值论层面，彰显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将自我革命的评价标准锚定于人民群众获得感。自我革命理论的提出，不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更在全球政党治理领域树立起内生型治理的光辉典范。

第三，伟大建党精神的体系化凝炼。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①的伟大建党精神，实现了对共产党百年奋斗精神密码的学术化表达。

这一凝炼包含三重理论建构：其一，在历史逻辑层面贯通精神谱系的生成脉络，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分散表述整合为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精神体系。这种整合并非简单叠加，而是通过真理、价值、实践、政治四维结构，揭示中国共产党精神特质的历史延续和时代创新。其二，在理论逻辑层面构建马克思主义精神哲学的中国范式。马克思虽提出精神生产理论，但未系统阐释无产阶级政党的精神建构规律。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伟大建党精神的体系化表达，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理论自觉、价值自觉、实践自觉、政治自觉的精神进化路径。其三，在实践逻辑层面确立精神引领的制度转化机制。通过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长效机制，将精神力量转化为党员干部的实践准则。伟大建党精神的凝炼不仅实现了百年管党治党经验的理性升华，更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精神建构的新范式：在主体维度，强调精神塑造对政党成员的价值引领；在客体维度，建立精神传承与制度建设的互动机制；在主客体关系维度，构建精神力量向治理效能的转化通道。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创新，既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永恒的精神坐标，也为世界政党文明贡献独特的价值理念。

（二）执政规律的战略判断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党的建设历史方位，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理论创造力，作出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判断。这些判断既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基本规律，又突破传统党建理论的问题域限，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中，构建起新时代管党治党的理论坐标系。战略性新判断的形成，本质上是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经验升华为规律性认识的过程，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螺旋上升规律的科学把握，标志着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第一，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价值判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8 页。

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①的重大理论判断，实现了党的领导理论的三重跃升：其一，在本体论层面重构党的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强调党的领导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则将党的领导由政治保障升格为本质属性，确立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本体论地位。这种理论突破既继承恩格斯关于“问题靠权威来解决的”^②的论断，又创新发展出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现代国家治理理论。其二，在制度建构层面确立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通过将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写入宪法，建立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机制，形成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执政体系，实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时代化发展。其三，在历史生成层面揭示制度本质和政党属性的内在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将党的领导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成性内核，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不是外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管理者，而是内生于制度体系的塑造者。通过党领导一切的实践纲领，实现政党政治优势和制度效能的深度融合，从而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根本政治保障。

第二，提出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的本质判断。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论断，在马克思主义廉政理论发展史上实现三个突破：其一，在腐败治理层面，将反腐败斗争提升至革命性重塑的战略高度。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提出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③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则创造性提出反腐败是“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④的政治判断。其二，在实践方法层面，构建起“三不腐”协同治理体系。通过不敢腐的强力震慑、不能腐的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的系统设计，将列宁计算和监督思想发展为全周期治理模式。其三，在价值评价层面，确立了人民满意的根本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负人民的价值导向，将反腐败成效的评价权交给人民群众，创新发展出马克思主义人民监督理论的中国范式。这种判断既继承毛泽东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政治嘱托，又通过制度性反腐实践给出新时代答案。

第三，强化“两个维护”的政治原则和实践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历史经验，以制度化的方式全面强化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要求，并将“两个维护”明确写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这一重大政治原则和实践要求的制度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权威理论的发展：其一，理论维度继承恩格斯关于权威与服从辩证关系的论述，创新发展出领导核心与指导思想双向保障的制度安排；其二，历史维度总结国际共运史上领导核心缺失的教训，确立“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⑤的执政规律；其三，价值维度确立政治忠诚的根本标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7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55 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年，第 507 页。

⑤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2 页。

准，将“两个维护”由政治要求升华为党员的价值自觉和纪律规范。这一重大举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规律的认识达到新境界，为全党提供了根本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三）理论阐释体系的丰富与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创新发展，不仅体现在概念范畴和战略判断的突破上，更在于其构建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更加系统完备的理论阐释体系。这一阐释体系通过深化理论框架的方法论基础、拓展系统边界，丰富和发展了对政党建设规律的认知。其核心要义在于：既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基本原理，又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政党治理的特殊性；既注重理论体系内部要素的协同，又强调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的系统关联。党建理论阐释体系的丰富完善，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通过理论框架的深化拓展和跨领域视角的融合，进一步提升了党建理论的系统性和解释力，为观察百年大党治理规律提供了更加深入的分析维度，也为世界政党政治理论贡献了中国智慧。

第一，全面从严治党理论框架的系统性构建。新时代党建理论阐释的深化，首先体现在对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系统性整合与创新。传统党建理论受限于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五位一体的平面化叙事框架，难以完整呈现政党治理的系统性和层次性。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总体原则，构建了涵盖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并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总体布局^①，实现了党建要素的立体化整合。

这种体系化构建的学理价值在于：其一，确立政治建设的统领地位，使党的建设的根本属性从组织功能优化升至政治功能强化，这既继承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属性的经典论述，又突破传统党建理论对政治建设的工具性理解；其二，将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动态支撑要素，形成“基础要素+保障机制”的复合结构，既坚持恩格斯历史合力论中多要素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又创新性揭示了制度治党与自我革命的内在统一关系。这种理论架构的突破性在于，它不再将党的建设视为若干并列工作的简单叠加，而是建构起核心统领—基础支撑—动态保障的有机系统，从而实现了党的建设的政治逻辑、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的高度统一。

第二，实现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协同。新时代党建理论范式的另一重大创新，在于构建起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协同分析框架。这一理论突破的实质是重新确立政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方位：既不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中“国家—社会”二元结构中的普通政治组织，也不是单向度的政治领导核心，而是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

^① 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8页。

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①总要求，本质上是通过政党治理效能的提升来牵引国家治理现代化。

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协同的理论创新体现在：其一，在认识论层面，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为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维度，既继承毛泽东“党是领导一切的”^②政治原则，又创新发展出党的领导、国家治理、社会发展三位一体的协同演进逻辑；其二，在方法论层面，提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③的实践路径，既坚持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又创造性解决无产阶级政党长期执政条件下革命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其三，在价值论层面，确立人民性作为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共同价值坐标，超越西方政党—国家理论的价值中立陷阱。这种协同的范式意义在于，它把党建理论从如何建设党的技术性探讨，升华为建设什么样的党才能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性思考，为理解中国政治发展规律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二、党的建设方法论的思维创新

思维创新是贯穿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方法论主线。这一创新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哲学根基，通过系统思维的整体性谋划、历史思维的规律性把握和辩证思维的创造性运用，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建方法论体系。它既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理，又赋予其新时代的实践特质，为破解复杂治理命题提供科学的思维范式和实践指引。

（一）系统思维的整体性谋划

新时代党的建设科学思维的创新发展，集中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系统方法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系统思维要求从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和开放性等角度看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将系统观念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在战略布局、要素协同、路径递进等维度构建起系统思维的完整框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治理方法论体系。

第一，全局性谋划的战略统合。新时代党的建设突破传统就党建论党建的局限，创造性提出“四个伟大”战略框架，将伟大工程置于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系统场域中加以把握。

这种战略部署包含三重理论创新：其一，确立伟大工程的决定性作用，阐明党的领导作为政治保证和组织保障的双重功能，将政党治理能力提升视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其二，构建大党建工作格局，通过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辩证认知，揭示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互动关系，形成治党治国双向促进的理论范式；其三，发展内外联动的系统观，既强调把党的建设得更加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71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5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2页。

坚强有力的内在要求，又注重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外向拓展，实现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的深度耦合。这种全局性谋划在理论上破解了党建孤立化、碎片化的认识误区，在实践层面开创了党的建设与治国理政协同共进的新局面。

第二，结构性优化的协同逻辑。新时代党的建设在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的辩证关系上实现重大理论突破：创造性提出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相结合的原则，将法治思维嵌入政党治理全过程，构建起涵盖党章、准则、条例、规则的四级制度体系^①，形成“制”的刚性与“治”的活性有机统一；创新性形成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双轮驱动模式，在理论上解决精神引领和制度约束的协同难题。

这种结构性优化包含三个理论支点：其一，确立制度供给的体系化思维，通过党内法规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制度体系的系统集成和衔接配套；其二，构建软硬约束的转换机制，将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等柔性约束转化为监督执纪的刚性标准；其三，构建制度效能转化的传导机制，通过思想认同增强制度执行力，借助制度实践巩固思想自觉，形成价值内化到行为外化的良性循环。这种结构性创新标志着政党治理从要素叠加向系统集成的理论跃迁。

第三，层次性推进的治理进阶。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形成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治理路径，是层次性思维的典型理论范本。这种层次性推进机制的理论贡献在于：其一，确立标本兼治的动态平衡观，破解先治标后治本的机械思维定式；其二，构建“破—立—创”的螺旋上升模式，将阶段性治理成效转化为制度性创新成果；其三，发展风险防控的预见性思维，通过治未病理念前移治理关口，形成主动式、预防性的治理新形态。这种分层次、有步骤的治理思维，为复杂系统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范式。

（二）历史思维的规律性把握

新时代党的建设科学思维的创新发展，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对百年党史的规律性把握中实现了历史思维的理论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②，创造性发展出大历史观的分析框架、周期率破解的双重路径和历史主动精神的实践范式，建构起具有时代特质的历史认识论体系。

第一，大历史观的贯通运用。新时代党建理论突破传统历史观的经验维度，构建起贯通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立体化认知体系。

其创新价值呈现三重进阶：其一，确立长时段分析坐标，将党的发展置于中国近现代史百年变迁和社会主义运动交汇的时空坐标中考察，揭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③的客观规律。其二，创新历史经验的转化机制，通过对“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的创造性发展，实现历史智慧向现实要求的精准转化。这种转化并非简单复制历史经验，而是以

^① 参见《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67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76页。

^③ 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7页。

历史和现实的对话机制重构传统政治智慧的当代形态。其三，开创历史认知的实践导向，将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的历史追问与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时代命题有机结合^①，形成以历史自信支撑现实发展的认识论框架。这种大历史观的思维范式，在理论层面破解了历史与现实割裂的形而上倾向。

第二，创新历史周期率破解路径。新时代党的建设在历史规律认识层面取得革命性突破，其核心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规律的理论深化。“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②的重大论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求索。

这一理论创新包含三重突破：其一，发展规律认识的辩证维度，将毛泽东人民监督的民主路径与习近平总书记党的自我革命的内生路径辩证统一，形成内外协同的规律性认识论体系。其二，重构执政安全的实现机制，通过揭示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丧失革命精神的客观要求，确立持续自我革命作为维系政党先进性的基本保障。其三，创建规律转化的实践范式，将“窑洞对”的廉政命题升级为包含政治建设、思想净化、组织革新等多维内容的理论体系，使规律认知转化为制度创新的源泉。这种周期率破解的双重路径，在理论层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政党主体性的有机统一。

第三，历史主动精神的彰显。新时代党建理论对历史思维的创造性发展集中体现在历史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实践转化。其创新价值表现为三个维度：其一，创建历史自觉的实践转化机制，将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的客观规律转化为主动识变、科学应变的治理实践，形成把握战略机遇期的理论指导框架。其二，确立历史担当的价值坐标，以不负人民的政治担当，构建起政治勇气与人民立场的理论统一性，破解了利益调整中的价值选择困境。其三，发展历史创造的主体路径，通过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创新论断，将历史被动回应模式升级为主动塑造历史进程的实践范式。这种历史主动精神的培育和彰显，在哲学层面突破了宿命论历史观的限制，确立起马克思主义政党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地位。

（三）辩证思维的创造性运用

新时代党的建设科学思维的创新发展，突出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创造性转化和系统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将辩证思维升华为治国理政的实践方法论，在矛盾关系把握、破立关系处理、内外因互动等维度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建辩证法体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管党治党领域的运用开辟新境界。

第一，矛盾关系的科学把握。新时代党建理论突破传统管理思维中的“非此即彼”定式，在干部管理领域构建起“严管与厚爱”“约束与激励”的辩证统一机制^③。其理论创新包含三个

^① 参见《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89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2页。

^③ 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50页。

维度：其一，确立矛盾转化的中介机制，通过容错纠错制度设计，将约束性压力转化为创造性张力，破解从严管理与激发担当的实践悖论；其二，发展矛盾平衡的动态调节理论，构建“三个区分开来”的实践标准^①，在政治原则与工作创新的张力中开辟保护性空间；其三，创建矛盾转化的价值导向，以为担当者担当的激励机制促进消极约束向积极作为转化。这种矛盾处理范式在哲学层面实现了管理实践中否定性制约与肯定性激励的辩证统一，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干部治理范式。

第二，破立并举的实践智慧。新时代党的建设突破传统治理中破立分离的线性思维，在作风建设领域形成以小见大、破立互促的实践范式。其理论突破体现为三重建构：其一，确立量变突破的切入点选择理论，通过中央八项规定这个切口，实现由具体问题整治向政治生态重塑的质变跃升；其二，构建破立转化的时空辩证法，在破除形式主义中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将“破”的成果转化为“立”的根基；其三，构建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的协同机制，通过“关键少数”的示范效应带动“绝大多数”的作风转变，形成点面结合的治理格局。这种破立并举的智慧在方法论层面重构了渐进性改革和革命性变革的关系，为复杂系统治理提供可复制的实践模型。

第三，内外因互动的规律认知。“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著名论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建构。其理论创新包含三个层次：其一，确立内因主导的发展观，将党的先进性建设视为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根本保障，形成“自身过硬—抵御风险—引领发展”的内源驱动逻辑；其二，构建基因传承与时代创新的互动机制，在坚守红色基因本质内核的同时，创新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形态，实现政党本质属性和执政能力建设的辩证统一；其三，发展主客体转化的实践哲学，将外部监督压力转化为内部革新动力，通过接受人民监督激发勇于自我革命的主体自觉。这种内外因互动理论在认识论层面突破机械唯物主义局限，构建起具有主体能动性的发展哲学。

三、党的建设制度体系的协同创新

制度体系创新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从理论到实践的关键转化环节。这一创新聚焦党的自我革命制度化目标，通过领导制度的权威性重塑、组织制度的结构性优化和监督制度的系统性协同，将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它以制度建构回应理论命题，以机制创新破解实践难题，构建起理论、制度、实践相统一的治理闭环，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注入持久内生动力。

（一）领导制度的权威性重塑

新时代党的建设制度体系的创新发展，集中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领导制度的守正创新。

^① 参见《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2021年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96页。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领导权配置、领导方式革新、领导效能提升等维度构建起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党领导制度范式。这种制度创新，实质上构建了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双向驱动机制，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升格为国家治理的本体性要素，形成政治优势向治理效能的系统性转化通道。

第一，领导权配置的顶层设计。领导制度创新的核心在于政治权威的科学建构和制度转化。新时代通过系统构建“两个维护”制度，实现了领导权配置从政治原则向制度形态的创造性转化。其理论创新包含三重突破：其一，确立领导权威的制度化保障机制，将政治忠诚要求转化为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等具体制度安排，形成政治原则和制度规范相统一的权威维护体系；其二，构建领导权运行的制度框架，通过请示报告制度、政治要件办理规程等设计，将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本质要求转化为可操作、可监督的制度流程；其三，发展权威传导的层级机制，建立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接口，确保党中央权威通过民主集中制链条贯通各级组织。这种制度创新在理论层面破解了政治领导与制度治理的衔接难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权威建构范式。

第二，领导方式的时代革新。制度创新的生命力在于对传统治理范式的创造性超越。新时代通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的理论建构，将集中性学习教育取得的重大成果固化为经常性、长效性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创新，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原则的深化发展，有力推动了管党治党制度化水平的持续提升。其创新价值体现为三个维度：其一，创建政治教育的制度转化机制，将集中性主题教育成果固化为经常性教育制度，有效提升了思想建党的制度化水平；其二，发展理论武装的即时化机制，创新第一议题制度设计，建立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学习、对标、落实的闭环流程，形成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的制度通道；其三，构建领导方式的代际传承机制，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将党的初心使命转化为代际传递的政治基因。这种制度创新在认识论层面突破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割裂的西方治理逻辑，开创了价值引领和制度规范深度融合的领导方式新形态。

第三，领导效能的提升路径。党的全面领导是对党和国家事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根本问题，制度创新的实践价值集中体现为领导效能的系统提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通过构建“部署—督查—考核—问责”的闭环机制，在理论层面破解了党建业务两张皮的治理悖论。其理论突破包含三重创新：其一，确立制度执行的问题导向机制，通过清单管理将抽象政治要求转化为具体责任事项，构建起政治标准和专业标准相统一的任务解码体系；其二，创建过程控制的动态调节机制，运用述职评议、政治督查等制度工具，形成目标设定和过程纠偏相协同的治理逻辑；其三，构建效能评价的复合标准体系，将政治效果、法纪效果、社会效果统一纳入考核范畴，构建起多维度的制度效能评估模型。这种闭环体系在方法论层面将控制论原理创造性运用于政治领导实践，在价值论维度确立制度效能最大化的评价标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效能提升路径。

（二）组织制度的结构性优化

新时代党的组织制度创新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组织建设理论的系统性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组织体系现代化目标，在组织路线设计、功能优化、党员管理等维度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结构性改革范式，开创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的理论新境界。

第一，组织路线的创新发展。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创造性提出“五个体系”建设理论（素质培养、知事识人、选拔任用、从严管理、正向激励体系）^①，在方法论层面实现了三大理论突破：其一，创建组织建设的全链条制度设计理论，将干部选育管用各环节从离散状态整合为有机系统，破解制度衔接的断点问题；其二，确立标准体系的动态适配机制，通过政治首位原则和专业能力复合标准的辩证统一，构建起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的立体评价模型；其三，创新制度供给的弹性调节理论，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制度的协同框架，解决从严管理与激发活力的实践悖论。这种创新标志着组织路线从经验性实践向科学性制度的范式转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治理方法论体系。

第二，组织功能的优化升级。基层党组织功能重构的理论创新集中体现为政治属性和治理效能的双向提升机制。其突破性价值包含三重维度：其一，实现政治功能、组织功能、服务功能的深度融合和层级递进，通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制度创新，将政治引领力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其二，构建跨层级协同的制度接口，以“街道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破解条块分割治理困局，形成“纵向贯通、横向协同”^②的立体化治理网络；其三，发展组织嵌入的社会整合理论，通过红色物业等制度设计，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单元，实现政治优势向治理优势的创造性转化。这种功能升级在认识论层面突破传统就党建抓党建的封闭思维，开创了基层党组织引领治理现代化的新范式。

第三，党员管理的制度创新。新时代党员管理制度创新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理论命题，在方法论层面形成三大突破：其一，创建党员素质的量化评价体系，通过积分制管理将抽象的党性要求转化为可测量、可比较的指标体系，破解党员评价模糊化难题；其二，构建空间流动中的组织管理模式，创新双向共管机制（流出地和流入地协同管理），将流动党员纳入全域化、动态化管理系统，解决传统属地管理的时空局限；其三，创新党员教育的精准供给理论，依据不同群体特征实施分类管理，建立差异化教育方案和个性化激励机制。这种制度创新在价值层面实现管理约束和价值引领的辩证统一，推动党员队伍建设从规模控制向质量提升的范式转型。

（三）监督制度的系统性协同

新时代党的监督制度创新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的革命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自我监督难题，在监督体系整合、权力制约机制、制度执行保障等维度构建起具有中国特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人民日报》2021年6月3日。

^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841页。

色的监督制度范式，实现了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理论的历史性突破。

第一，监督体系的整合创新。传统监督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催生集成式监督的理论突破。新时代创造性构建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四项监督”贯通协调机制^①，其理论创新包含三重建构：首先，确立监督合力的生成机制，通过纪律监督的刚性约束、监察监督的全覆盖优势、派驻监督的探头功能、巡视监督的政治体检特性形成功能互补的监督矩阵；其次，创建监督资源的配置理论，运用室组地联动模式（纪检监察室+派驻组+地方纪委）实现监督力量的结构性耦合，破解条块分割导致的监督碎片化难题；最后，发展监督信息的协同处理理论，建立问题线索集中管理、分类处置、跟踪督办闭环机制，将分散监督信息转化为系统治理依据。这种体系创新在认识论层面突破传统监督的线性思维，形成了立体成像式的监督新范式。

第二，权力制约的制度突破。权力运行规律认识的深化推动监督理论的范式变革。针对关键少数监督难题，新时代监督制度实现三重理论创新：其一，创建权力边界的动态界定理论，通过“三重一大”（即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运作^②）决策监督机制将抽象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其二，构建权力制约的复合机制，形成“任职回避、定期轮岗、离任审计”^③等制度组合拳，破解权力固化的周期性风险；其三，发展权力运行的透明化理论，“建立健全党的领导干预重大决策事项记录制度”^④，实现隐性权力的显性化监管。这种制度突破在方法论层面实现了从盯人到盯权的监督重心转移，构建起用权必受监督的现代权力观。

第三，制度执行的保障机制。监督效能的理论重构聚焦制度生命力的持续激活机制。新时代通过构建监督制度执行保障体系，在三个维度实现理论创新：首先，创新制度刚性的生成理论，通过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把制度权威具象化为具体主体的政治责任；其次，发展制度效能的传导机制，运用“一案双查”（查违纪问题、查管党责任）将案件查处转化为制度完善动力；最后，构建制度优化的动态机制，建立制定、执行、评估、修订的螺旋上升闭环，使制度体系具备自我更新的理论品格。这种保障机制在价值层面确立了制度治理的闭环逻辑，打通了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理论通道。

（焦晓云系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汪世锦]

① 参见《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95页。

② 参见《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546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549页。

④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46页。

spatial justice narratives center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narratives emphasize 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s. These represent the main types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narratives and are important dimensions of reform with specific value orientation.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realization of types of justice such as economic justice, spatial justice and social justice, the further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s are to focus on the following key areas: strengthening rigid constraints of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protecting various forms of property rights in a legal, equal and sustainable manner, promoting equal exchange of urban and rural factors, and advancing the equalization of social public services, thus forming a focal narrative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The narrative system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the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s effectively coordinates the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social justice, while effectively easing the dialectical tension betwee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value adjustment.

The Creative Application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 Zhang Guozuo and Pei Yang (29)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is the diplomatic componen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ts rich content embodies a creative application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hining with the brilliance of the combination of basic Marxist tenets an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ontains many essential ideas for diplomatic interactions, such as the ideal of “the world as a common good” and “world harmony”, the importance of trust and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friendly ties with benevolent neighbors, the prioritization of righteousness and the balance of justice and individual interests, and the principle of maintaining harmony while respecting difference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creatively transformed and innovatively developed these philosophical concepts, proposing a series of original diplomatic thoughts, including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strategies opposing hegemony and power politic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a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These contributions have significantly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ooted in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greatly enhancing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This has created a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nation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Chinese modernization, while also contributing Chinese wisdom and solutions to the common challenges facing humanity.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Thought on Party Building

..... Jiao Xiaoyun (39)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thought on party building aims in practice to address the unique challenges faced by a large party in the new era. It achieves a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eories on party building from three dimensions: foundational theory,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institutional system. For the foundational theory, it establishes a core framework based on key concepts, strategic judgments and research paradigms. In terms of scientific thinking, it constructs a unified methodological system that incorporates systematic thinking, historical thinking and dialectical thinking.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it forms a governance structure characterized by the multidimensional collaboration of leadership, organizational and supervisory systems. This ideological system is marked by distinct timeliness, systematic coherence and practical relevance, providing fundamental guidance for the new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